

# 文化同构与族群融合

---


多元一体格局下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

历史演进

---

陈思 主编

 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研究出版社

非外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同构与族群融合:多元一体格局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演进/陈思主编.--北京:研究出版社,2023.3

ISBN 978-7-5199-1379-3

I. ①文… II. ①陈… III. ①中华民族-民族意识-研究 IV. ①C95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2)第215175号

出品人:赵卜慧  
出版统筹:丁波  
责任编辑:寇颖丹

文化同构与族群融合

WENHUA TONGGOU YU ZUQUN RONGHE

——多元一体格局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演进

陈思 主编

研究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006 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大街100号华腾商务楼)

北京云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

2023年3月第1版 2023年3月第1次印刷

开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19.5

字数:295千字

ISBN 978-7-5199-1379-3 定价:75.00元

电话(010)64217619 64217652(发行部)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 序

彭 勇

1935年，25岁的费孝通先生从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不久他便来到广西金秀大瑶山，开始了他的第一次瑶族社会考察。此后的数十年间，他多次来到这里调研。新中国成立后，他还参与和组织了全国性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进行系统性的民族历史和社会文化的调查和研究。五十多年后的1988年，78岁的费老在香港参加学术活动期间，完成并发表了著名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一文。他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观点，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又有中央民族大学陈连开先生、兰州大学谷苞先生等众多学者，从历史学、考古学和民族学等领域进行的实证研究和整体分析，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这一理论在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学界引起巨大反响，也为今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基础。

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时常要面对“学术研究因何而存在”这样的思考。无论是在学术的追问上，还是在对现实的思考上，费孝通先生从作为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的奠基人和新中国著名社会活动家、政治家的双重身份，都给我们做了很好的诠释，那就是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既要遵循学科研究的基本属性和学术发展的基本规律，又要立足祖国大地，服务国家、服务民族和服务社会，二者相辅相成，并行不悖。

由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的陈思同志策划、主持编写的本书，基于一个完整的历史脉络、完善的结构体系而组织形成，且邀请了各领域内的专家学者，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为抓手，紧紧围绕“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演进”来谋篇布局，精心设计篇章结构，甄别史料讲好故事，集萃撷英凝练观点。所以每

篇论文各有特色，整本书又在内容和逻辑上层层推进，构成一个内容丰富、深刻的有机整体。本书所思考的，就是在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背景下，如何从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社会学和法学等多学科角度，深入研究阐释中华文明发展史，深入研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演进的历史路径，充分挖掘历史时期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历史事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心共筑中国梦，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理论支持和历史智慧。这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新议题和新使命。本人也想就这一问题谈一点自己不成熟的想法，或有助于读者阅读全书。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四大原生文明之一，也是其中唯一未曾中断、延续至今的文明，它的遗传密码或基因谱系到底是什么？历经几代学者的持续努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取得了突破性的研究成果，陆续给世人梳理出中华文明起源发展历程，展现了早期中国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揭示了中华文明更加丰富的内涵，也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2022年5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第39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会议，并指出了中华文明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大意义。他说，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五千多年漫长文明发展史中，中国人民创造了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要把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同中华文明特质和形态等重大问题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深入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起源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阐明中国道路深厚的文化底蕴。

作为国家科技攻关重大项目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即“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项目，开始于20年前。据项目首席专家王巍先生介绍，该工程重点对浙江余杭良渚遗址、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和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等都邑性遗址，以及分布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辽河流域的其他中心性遗址及其周边的聚落群实施发掘和大规模考古调查。“探源工程”基于中国考古材料，兼顾其他古老文明的特点，提出了判断人类进入文明社会标准的中国方案，项目取得了许多重大原创性收获。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以考古学、历史学为基础的跨学科综合性研究工程，是一项复杂又漫长的系统工程，也是一项循序渐进的科研活动。“探源工程”坚持历史科学研究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统一，逐步还原了中华文明从涓涓溪流到江河汇流的发展历程。在“探源工程”之前开展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同样是研究中华文明发展史的重大项目。该工程对夏商周时期若干重大历史事实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所形成的若干基本共识，既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发展史，也揭示了中华民族走过的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体的发展历程，把中国文明历史的研究引向深入。

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具有世界文明普遍存在的共性，也有中华文明所独有的特质。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 1883—1969）在他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的“轴心时代”命题，就很好地诠释了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全世界范围内，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这一时期尤其是公元前500年左右，中国与古代希腊、古代印度等国家都产生了一批伟大的思想家，包括孔子、老子、孟子、庄子、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释迦牟尼等，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世界上不同的文化传统，是人类文化突破现象，共同影响到人类文明后来的发展，可称为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轴心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0月15日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中华文化的重要性时，认为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命题，“很深刻，很有洞察力”。在五千多年漫长的文明发展史中，中华各民族创造了璀璨夺目的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取得的重大突破，为深入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起源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提供了理论支撑、科学基础和方法实践。关于中华民族历史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演进的研究，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实体，不是把56个民族加在一起的总称，而是56个民族已结合成相互依存的、统一而不能分割的整体。中华民族这种多元一体格局，经历了从分散的多元到合成一体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各个民族所有的归属成分都已具有高层次的民族认同意识，即共同体感、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感情和道义。中华文明满天星斗，灿若星河，“探源工程”取得的最新成果，进一步

证明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属性特征。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也是中国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加深的过程，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必然结果。费孝通先生在论述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时说，中国作为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许多民族都有悠久的历史，在其历史发展演进过程中，他们不仅分别创造和发展了各具特色的社会文化，而且通过交流、融合、分化，相互依存和相互促进，共同缔造了一个包括各民族在内的整体——中华民族，绵延持续，保持了我国文明的连续性和推陈出新的创造性。的确，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历史。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中华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逐步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构建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可以说，中华民族从远古走来，是由“自在”到“自觉”形成的一个民族实体；再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自为”发展阶段，其发展动因是来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目标凝聚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华民族的共同体形态在多元一体格局基础上进一步凸显。这就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逻辑。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在今天就是要进一步发挥历史学科的重要作用，尤其要不断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研究阐释。充分挖掘、系统整理、大力宣传我国各民族自古以来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和深刻内涵，讲好民族团结进步的故事，引导各族群众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看到民族的走向和未来，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是命运共同体，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心灵深处。通过历史研究阐释，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在理想、信念、情感、文化上的团结统一，守望相助、手足情深。

当前，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的研究和编纂工作已列入国家“十四五”发展规划和2023年远景目标纲要，正在有条不紊地推进。2022年1月25日，《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编纂工作部署会在北京召开，本人也将参与这一伟大的国家重大文化工程当中。编纂《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是在国家层面为整个中华民族著史立传，是赓续盛世修史传统的重要文化工程，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心聚力工程，是加强历史研究、促进人才培养的强基培元工程，既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又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既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又有鲜明的时代意义。深入开展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研究和编纂工作，就要完整准确全面把握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站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立场上，坚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并将其贯穿于整个编纂过程，深入挖掘阐释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等方面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深刻体现各民族在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讲清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起源、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彰显我们辽阔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悠久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灿烂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伟大民族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进而引导各民族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是我们在新时代的光荣职责和神圣使命。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我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之间经过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发展成为完整的不可分割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内涵。让我们深入了解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史，进一步把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编纂工程等历史研究引向深入，尤其是深入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起源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径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过程，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源头活水，更加完整准确地讲述中国古代历史，讲述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历史，更好地发挥以史育人作用，不断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同心共筑中国梦，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

2023年1月1日

于中央民族大学

# 目 录

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华民族	顾 春	1
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及其长存之道	韩建业	18
商周易代及其特殊历史意义	顾 春 侯 浩	31
先秦文化礼义核心与夷夏共同体重组	陈 煜	45
春秋战国时期三晋、齐鲁和楚越三大文化圈的融合	包振宇	59
秦的政治统一、文化整合与制度延续	黄 海	66
从黄老之术到独尊儒术：汉代的思想变迁与文化统一	顾 春 侯 浩	73
十六国北朝诸政权的华夏化变迁	吴天宇	78
多民族共融的开创与拓展： 隋唐大一统格局的定鼎与文化辐射	蒋爱花 郎 朗	94
诸族共建：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交往、交流与交融	廖靖靖	106
10至17世纪中叶中国多元人群的交融、重组与新生	丁慧倩	119
文化的同构：从“衣冠南渡”到南北融合	范依畴 贾雨啸	129
西南地区融入华夏一体的历史进程	蒋爱花 杜峥弈	143
明代构建“大一统”格局的探索： 程朱理学、科举教育、宗族制度	彭 勇 张幼欣	154

“板升”：明代汉蒙交流的缩影	蔡亚龙	168
“走西口”：跨越百年的移民、拓荒、开发、融合	胡姗姗	180
清代的汉化与儒化：思想文化领域的大一统构建	彭勇 王春伟	193
清代新疆的统一、建设与“锡伯西迁”的历史意义	刘姗姗	207
扶持与约束藏传佛教：清中前期实现“升平累洽”的抓手	牛绿花	218
清代台湾的多元社会治理与文化融合	杨潇	224
清代碑刻：多元文化融合的历史见证	魏建东	235
清代儒学核心的盛衰	陈思	243
“闯关东”：中原文明重塑东北	曹流 姚江	250
从自在到自觉：清末民初现代中华民族意识的历史演变	陈鹏 刘凯捷	261
从“夷夏之辨”到“多元一体”：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演进	宋玲	270
中国共产党建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新面貌	周竞红	282
轴心时代、中华文明与未来人类文明构建	陈思	293
可爱的骨头（代后记）	陈思	300

# 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华民族

顾春\*

中国和中华民族有着光辉灿烂的文明和历久绵长的历史，这个历史（指文明史）计有五千年之久。按照我的理解，我把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历史分为前后相继的两个阶段，前者为传统社会，后者为现代社会。在有阶级的社会里，当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都认同等级制度的合理性，当时的社会也是建立于等级观念和等级制度之上的，这样的社会，我称之为传统社会。传统社会之后，就是现代社会。据此，自夏商至清代，就是中国的传统社会，走向共和的民国之后，就是中国的现代社会。本文的内容所及为中国的传统社会。

我们常说，中国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在我看来，这八个字大有深意。按照流传既久的说法，全世界共有四大古代文明（也有说六大古代文明的）。与其他古代文明相比，中国和中华民族具有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我认为至少有以下八条。

第一，历史十分悠久。距今已有三千七百年的二里头遗址<sup>①</sup>，是中外学界所公认的中国古代文明标志。2019年7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将良渚古城遗址<sup>②</sup>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进一步表明，国际社会业已认同中国的古代文明迄今已有五千年。

第二，种族未曾更替。自远古至先秦，先之以诸夏，后之以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貉），历经周初的封建和制礼作乐、春秋战国的民族融合，形成和发展了华夏族。自华夏族以下，源泉混混，开枝散叶，并在汉代形成了汉族。到了唐代，伴随着更大规模的民族融合，又有了“唐人”之

---

\* 顾春，男，1965年出生，山东博兴人。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著有《陆九渊教育思想研究》《人之为人》《来源·争论·特性——陆九渊教育思想三论》等。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华民族史、宋明理学史、明史、清史等。

① 在今河南省洛阳市。

② 在今浙江省杭州市。

称。之后，以汉族为主体，周边民族又接续不断地加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来，各民族间的交流和融合不断深入，最终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

第三，文字未曾中断。中国的古文字起源于陶刻、彩绘符号和玉器、石器、骨器刻文等，至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初步形成了以方块字为特点的较成熟、较完整的文字系统。之后，经金文、小篆及至隶、草、楷、行的书体演变，最终发展为今天的文字体系。以上不同时期的文字虽书型有差、字形分殊，但都与最早的文字一脉相承、绳绳相继，古今文字实为一体。中国文字的古今同源和一贯而下，使我们得以借此认识祖国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

第四，史载传承有序。按照中国现存的史籍所载，中国有确切纪年的历史始于西周的共和元年。也就是说，从公元前841年开始，中国就有了不间断的、系统的历史记载。《史记》以下，正史、实录、方志、谱牒等粲然在列，中国成为全世界唯一的史学高度发达的古老国度。而自近代以来，随着甲骨出土和新的考古发现，我们对历史编年的认证又提前了两千年。

第五，文化一脉相承。从商人尊神到周公制礼作乐，华夏族实现了由神到人的重大转变，开启了德治之路，并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所继承。之后，虽历诸代百家争盛，并之以外教东渐，而相推相荡、相克相生，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化。

第六，疆土与日俱宏。早熟和高度发达的华夏文化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向心力，不仅使中国的人口不断增加，疆土也如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到清朝乾隆年间，中国的陆地疆土面积达1300多万平方千米。这个过程不仅是国土的开发和对疆土的有效治理，更重要的是，使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断发展和巩固，奠定了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基础。

第七，统一成为大势。中国的国体先后经历了部落、封建和郡县三个时代。其间，邦国的数量先是从周初相传的约1800个，急剧减少为春秋时期的100余个，到战国后期形成了七雄并峙的局面，并最终由秦统一中国。之后，割据和统一交替上场。到了宋代，中国发生了几个重大变化，即北人南迁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大发展和南北方交流，科举制度的推行，使大一统的国家观念和忠孝核心价值观成为主流思想，道学的诞生使主流文化更为成熟。这几个重大变化，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更高水平发展，促进了中华各民族的

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从此之后，中华各民族大多认为统一是件正常的事情，统一是常态，而割据是变态。因此，自宋以后，中国就没有出现过长期和大规模的地方割据，走向统一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大势。总之，林立之西周，争雄之战国，对峙之南北（朝），颉颃之宋辽，虽历九曲，数度分合，终成一统之中华。

第八，倡礼义而远宗教。中国人一直相信道德的力量，主张以德治国、以德润身，以仁义之理和等级之礼处理人和事，至于六合之外，则“圣人存而不论”<sup>①</sup>。中国虽长期存续各种宗教，其中既有本土的宗教（道教），也有外来的宗教（如佛教、伊斯兰教等），还有难以胜数的民间宗教，但自西周走上敬德保民之路后，中国人大多以“祭神如神在”“宁可信其有”的态度对待宗教和鬼神等，宗教从未占据主导地位，未曾成为主流文化，更没有统治过中国。中国被称为文明古国和礼仪之邦是当之无愧的。

以上八条，既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特点，也是中华民族的特点。如果这八条成立，我们可以说，中国和中华民族走过了一条与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有所不同的道路。

中国和中华民族之所以具有以上这些特点，原因是极为复杂和多方面的，但我认为，以下五个方面是起决定作用的，它们分别是：一、商周易代的特殊性；二、中华文化的早熟和高度发达；三、秦始皇所确立的皇帝制度和中央集权制度；四、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五、科举制度的全面推行。

#### 第一，商周易代的特殊性。

约在公元前11世纪中叶，周武王联合各路诸侯灭商并建立周朝，史称西周。在西周以前，政治中心长期位于黄河中下游流域，也就是在今河南省商丘和安阳一带，而周人则一直生活在今陕西西安以北以西的泾渭地区，因此，在商代的政治格局中，周不仅是小邦，而且地处偏远。到了商末，周人的势力已强大起来，但其灭商仍然具有相当大的偶然性。周之灭商，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商纣王的执政失措和无道使其众叛亲离，二是周联合八百诸侯共同伐商。这两条，决定了周人灭商后的执政思想和统治格局。具体为：

<sup>①</sup> 曹基础：《庄子浅注》，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1页。

第一，从神教向德治转变。在商代，人们普遍相信天命的力量，神是统治一切的，胡适就曾说“殷人的文化是一种宗教的文化”<sup>①</sup>。比如，当西伯侯即后来的周文王攻克距商朝都城朝歌不足200千米的黎国、情况已万分危急时，商纣王竟然说“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sup>②</sup>。但是，自居天命在身、拥有巨大都城的东方大国大邑商却最终为小邦周所灭而亡国。这一重大事变促使周人重新审视天命，并认为天命可信不可恃，人的作为可以影响天命移易，百姓的意思可以上达天命，只有敬天保民、明德慎罚才能永保天命。这些重要思想表明，西周社会逐步由神本向人本、由神权政治向伦理政治、由祭祀文化向礼乐文化转变。从此，中国告别了神教社会，开启了后来的以德治国之路。第二，商人的宗族组织得以存续。商王军队的临阵倒戈，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商朝的军事力量并未受到根本性打击，二是军队反对纣王。但是，反对纣王不等于拥护周王，因此，西周必须用妥协的办法建立和维持自己的统治。具体表现在：周人在祭祖时，虽然周人的祖先居首，但同时以商人祖先陪祭；笼络商人贵族，保留商人的宗族组织，并以原来的宗族长督率各自宗族；为防止商人造反，让几个大的宗族成建制地搬迁到异地，并派亲信予以监视。之后，这种以血缘关系最近的人群所组成的宗族长期延续至后世。第三，周公制礼作乐。制礼作乐据说是周公所为，有关记载可见于《尚书大传》《左传·文公十八年》《礼记·明堂》《史记·周本纪》。这套礼乐制度被后来的“三礼”<sup>③</sup>作了系统追记。可以想见，在礼乐初成之时，不可能形成如此周详的制度，但是，这些典籍所反映的基本精神是符合周礼的。<sup>④</sup>《左传·隐公十一年》载：“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又载：“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sup>⑤</sup>也就是说，礼是处理天地人三者关系的总规定，是维持社会秩序的总法则。周礼的基本精神是“亲亲尊尊”两个方面：国家和社稷是建立在等级制度之上的，所以要“尊尊”，也就是尊重应该尊重的人，这里的人当然

① 胡适：《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506页。

② 《尚书正义》，载《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77页。

③ 指《周礼》《仪礼》《礼记》。

④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6页。

⑤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457页。

是指贵族；人民及其后代都依血缘分属各自的宗族，所以要“亲亲”，也就是要亲爱应该亲爱的人，这里的人当然是指血缘亲族之人。而从《礼记·曲礼》等典籍对周礼的描述来看，礼不仅是全社会行为准则的总纲，而且还指各种社会关系的具体规范，包括了制度、礼仪和伦理道德等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殷周之际的这场偶然剧变及其结果，对后世的影响不可低估。首先，西周统治者的天命可信不可恃的思想，既强调了人的有为，又认同天的制约，不仅使中国很早就开始了从神到人这一历史性的巨大转变，而且使中国人形成了尽人事而听天命、勤劳顽强的民族性格。其次，西周统治者的敬德保民、崇拜祖先、亲亲尊尊等思想和以此建立的礼乐制度都为后世所继承，并发展为礼教，成为中华民族共同遵循的行为准则和规范。而宗族组织较完整的保存延续，则为礼教社会的形成、忠孝核心价值观的建立等提供了条件和可能。总之，商周易代和制礼作乐对后世的影响是全面、广泛和深刻的。

## 第二，中华文化的早熟和高度发达。

现在看来，中国的古代文明发源地肯定并非一个，但最早兴盛起来的地方却是在黄河中下游流域。居住在这个地方的人被称为诸夏，诸是多的意思，就是多个夏族的人生活在此。早期文明的重要标志是建城，而城就是国。从字形即知，国是个四方块，国就是一个四方的城，国及其周边之外被称为野，国与野合而为邦。所以我们可以说联邦，而不能说联合国。由于最初的诸夏居于黄河中下游流域，与周边民族相对而居其中，故称中国。中国一词最早可见于西周时期青铜器上的何尊铭文，到战国时期已普遍使用，并与夷狄相对，如孟子就说“莅中国而抚四夷”<sup>①</sup>。总之，与周边民族相比，诸夏的经济和文化发展最早，代表着文明和先进。由此，先进的诸夏便被称为华，周边的民族便被统称为夷，于是诸夏又称华夏，中国又称中华。

华夏文化大发展的重要标志就是人所周知的百家争鸣。一般认为，百家争鸣起于春秋末期的孔墨之辩，持续到战国时期齐国稷下学宫的消亡。在这长达二百多年的时间里，诸子蜂起、处士横议、各家并出，前后相继，形成

<sup>①</sup> 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6页。

了著名的百家争鸣。诸子百家的著作在蒙受秦燔之后，又历经长时间的岁月淘洗，现已难窥全豹。但即使从留存下来的《老子》《庄子》《论语》《孟子》《荀子》《韩非子》等典籍看，它们所表现出的恢弘气势、博大规模、华贵气派和深邃思想依然令人低回向往。当我们今天重新读其书、想见其为人时，在心灵受到巨大震撼之余，不得不由衷惊叹：这些登临文化高峰的思想巨子似有神助，简直不可思议。诸子百家不仅围绕着王与霸、礼与法、义与利等治国大道展开激烈争辩，还广泛涉及天道与人道、天命与人事和名与实、志与功等抽象玄远的哲理思辨，不仅为秦统一中国作了相应的理论准备，还大大提高了中华民族的理论思维水平，大大丰富了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

近百年来，殷墟甲骨和大量出土文物的发现，使我们对两千多年前的遥远时代又有了新的更深认识，其源有自的先秦文化及其发展过程和脉络变得更加清晰可信。从先秦出土文献和各种早期典籍的文字表现形式看，其发展脉络正如小孩儿的说话，也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大致是：甲骨文是一个字一个字的，春秋末期《老子》《论语》是一句一句的，战国中期《孟子》是一段一段的，战国中后期《韩非子》是一篇一篇的，随后的著作自然就是一本一本的。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可以更有把握地认定：早在先秦时期，作为早期中华文化的杰出代表，华夏文化就具备了两大重要特点：一是早熟，二是高度发达。早熟的特点预示着之后的中华文化会接续先秦文化并据此发展下去，而不会出现文化中断或改弦更张。而高度发达则对周边民族产生强大的吸引力和向心力。由此，就有了华夷之辨，并以此来分别族类和区别先进与落后。在华夷关系上，华夏族对夷族主张“以夏变夷”，虽有夷夏之防，但并未把夷排斥在外。而周边的夷族，既向往华，又不自甘为夷，纷纷主动学习华夏的礼仪制度，于是这些夷族也就逐渐变成了华。华夏文化的早熟和高度发达，使华夏族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这种滚动既是地域越变越广的过程，也是人口越聚越多的过程，更是各民族不断加深交流和融合的过程。到了秦统一中国之初，华夏族已大体形成了三个文化圈，即齐鲁三晋的中原文化圈、关中地区的西部文化圈和南方的楚越文化圈。到了汉代，随着民族融合和民族认同的不断演进，生活在这三个文化圈中的人们逐

渐形成了更加相近的民族意识、民族性格、民族文化和民族习俗，于是，这三个文化圈逐渐融合为共同的中华文化圈，并随之诞生了中华民族的主体——汉族。

早熟和高度发达的中华文化，对秦汉以后的历史发展进程持续产生着巨大影响。其中，先秦的华夷论又被西汉儒家的公羊学派予以理论化。公羊学派继承孔子的华夷思想，一方面主张严夷夏之防，坚持华夏中心论，反对以夷变夏。另一方面，又主张以华变夷，通过怀柔四方，使之近悦远来。认为凡是赞成并实行中国的典章制度和文化的，夷狄就变成了中国，这是新的中国；而虽居中国而行夷狄之道，也就不再是中国，而是新的夷狄。公羊学派的这些思想为后世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所继承。比如，唐代的韩愈曾说：“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进于中国，则中国之。”<sup>①</sup>这与公羊学派的主张是一致的。

在汉代以后，继华夷论而起的是正统论，之后又有了建立在朝贡体系基础上的宗藩思想，其中存在的民族偏见是可以想见的。但是，它同时说明，作为早熟和高度发达的中华文化，在数以千年计的长期历史过程中，始终保持着文化领先的地位，它也成为中国长期作为东亚地区政治和文化中心的重要原因。

### 第三，秦始皇所确立的皇帝制度和中央集权制度。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并建立了皇帝制度和中央集权制度。中央集权是与地方分权相对的，它所针对的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集权的本质是地方服从中央，地方官吏由中央任命和管理。皇帝制度所处理的是皇帝和百官的关系，它的本质是皇权至上和皇位世袭。当皇帝的权力不受约束时，就成为专制制度。在自秦以后的两千多年中，中国的皇帝制度和中央集权制度从未发生根本性改变，到明清时期更发展成为中央集权专制制度。所以，谭嗣同说“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sup>②</sup>。其中，有两个方面对后世影响最大。一是废除分封制，建立郡县制。前面说过，西周以分封制来平衡利益和瓜分权力，通过给自己的亲贵和帮助他们打天下的各路英雄裂土封侯来维持

① 《韩昌黎全集》，中国书店1991年版，第174页。

② （清）谭嗣同，吴海兰评注，《仁学》，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96页。

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到了春秋时期，有些诸侯国已开始边疆和新土实行郡县制。秦始皇全面实行郡县制后，就在全国范围内把管理老百姓的官直接控制在自己的手里。二是统一文字和度量衡。统一文字十分重要，意义不言自明。比如，直到现在，在一些山高谷深、交通不便的地区，两县相邻的人们相互说话都难以听懂，没有统一的文字人们怎么交流？共同的民族意识怎么形成？统一度量衡也同样重要。有了统一的度量衡单位，不同地区的人们才有可能做买卖。有了经济交往，有了人口流动，也就有了不同地区的人们之间的其他社会活动，包括婚姻和文化活动等随之而来。不同族类和不同地域的人们在一个锅里吃饭，自然就成了一家人。

到了汉初，刘邦（公元前256—公元前195年）曾在继续实行郡县制的同时，分封了不少同姓和异姓王。为防止谋乱，他又陆续剪除了异姓王，而在他死后，同姓王也开始造反，这就是七国之乱。之后，历代的统治者大多认识到分封制绝非长治久安之策，于是，郡县制成为后世主流，并延至明清。

到了明代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时，他不仅全面继承了秦始皇所确立的皇帝制度和中央集权制度的精髓，而且绞尽脑汁地设计了一套更为严密和周详的制度。他所做的事情主要是两件：一是解决了君权和相权之争问题，二是分割中央和地方官吏的权力，并使之相互制约。在中国古代，君权和相权也就是皇上和宰相的矛盾长期存在。朱元璋把宰相胡惟庸杀掉之后，就彻底废除了宰相制度。在朝廷，为了制约各级官员，他在中央六部之上，对应设立六科。六科官员虽官居七品，却品卑位尊，上可封驳皇帝旨意，下可督察六部。之外，又设立督察官员的都察院，分省设立十三道监察御史。在军事上，分设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与兵部协同管理军队，其中，五军都督府有统兵权而无调兵权，兵部有调兵权而无统兵权，两者相互节制互不统属。在地方，于各省设立三司，将权力一分为三：布政使司管民政，按察司管刑名并纠察百官，都指挥使司管军事和军队，三司同有相互监督之权。为了统一管理和协调各省事务，从景泰时期（1450—1457年）始，设立巡抚节制三司，后又设总督，督抚之设渐成定制。总的说来，以上这些办法的长期实行带来两个结果：一是皇帝的权力更加集中，使皇帝制度的专制色彩更加明显；二是朝廷对地方的控制不断加强，中央集权制度更加完善，